

# 拉合尔博物馆收藏的锡克里 犍陀罗艺术藏品概论 (下)

[巴基斯坦]赛义夫·拉赫曼·达尔 (Saifur Rahman Dar) 著

房学惠 (FangXuehui) 王 宇 (WangYu) 编译

## 关于收集品

为什么锡克里遗址出土的所有文物都被送到拉合尔博物馆,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尽管迪恩在他的最后报告中指出:他在等待指示,但最终没有得到特殊的命令。实际上,此时,在印度考古调查局总官的请求下,就处置锡克里文物问题,政府已经出台了一项政策。内容是“应该为任何一次发掘的所有物品送进公立博物馆做好周密的安排”。同样,也明确地规定出土物品应该送到最近的省级博物馆。对于这个遗址而言,就是拉合尔博物馆。

锡克里发现的物品于 1890 年 3 月被送进拉合尔博物馆,随即,匆匆忙忙作了登记。1894 年,新的博物馆建筑落成时,它们部分或全部多次在雕刻品画廊展出。然而,它们没有被准确地登记,甚或未很快将其数量统计清楚。只是到了 1897 年,在阿尔夫雷德 (Alfred) 的要求下,由时任馆长安德鲁斯 (W. H. Andrews) 主持完成。富歇 (Foucher) 着手准备一个粗略的未作标记的锡克里雕刻品手写目录。馆里有不少无出处的犍陀罗雕塑品,当时其数量超过 1200 件。为了将这两部分区分开,安德鲁斯开始为锡克里物品作目录。他随意地从 2000 号开始往后排。这工作进行的时间长得超过预想,但它还是不完善的。1903 年,富歇发表了《锡克里(犍陀罗)浅

浮雕》,这似乎只是汇总锡克里收集品的目录,其后既未修订也没改动。我们见得较多的是超过 350 件存于拉合尔博物馆的雕塑品,它们经富歇之手但总数不明,只有 324 件能从保存的目录中得到证实。保存的完整的收集品陈列在雕刻品画廊的 16 个展柜中。1947 年独立时,拉合尔博物馆的收藏品被分割,来自锡克里的 98 件与出于其他地点的雕刻品一起被送到东旁遮普(印度),即现在昌迪加尔博物馆。陈列在拉合尔博物馆的锡克里收集品的数量在 1965 到 67 年大规模重新编号期间,更大幅度减少到 27 件。较破碎的收集品被搬到普通库房(因为在 1974 年之前,这博物馆没有一个适合古代遗物的专用库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藏品失去它们原始登记的序数和出处标志(用白油漆写的“S”和“Sikri”),这使得正确辨认它们的来源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在任职期间(1974—98),我极力摸索从继承下来的混乱的雕刻品之中确认锡克里雕刻品的方法。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犍陀罗库房被整理得整洁、干净和有序,并且将部分藏品作了记录,照了相。但是,对于藏品出处的认定,锡克里和其他遗址藏品数量的统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基本确定为锡克里雕刻品的只有 70 件,其他则模糊不清。残损者仍混在数百件的未编号的犍陀罗文物中,它们或在犍陀罗画

廊中展出或存放在犍陀罗仓库中。应该说拉合尔的照片档案对于进行辨认是十分有用的原始资料，它是1947年，布克塔尔（H. Buchthal）为伦敦大学的沃伯格（Warburg）学院摄制的。从这些照片可看到藏品上的编号和用白油漆写的出处记号“Sikri”。根据这种记号，伊丽莎白·埃林顿辨认出一个来自锡克里的阿特拉斯（atlant）力士像（acc. 2175#）。现在它已在昌迪加尔登记为2#。原来没有出处，它在拉合尔博物馆的最初编号的末尾三个数，以及它的采集地点记录都丧失了。

关于送到拉合尔的收集品和它们的尺寸，拉合尔博物馆，公共劳动部门，旁遮普和旁遮普政府办公室的记录均无重要的完整材料。即使一个收集品送到拉合尔之前或送去不久之后做了详细目录，它们似乎都已丢失。主要原因是旁遮普分离带来的混乱。其直接结果是拉合尔博物馆的藏品急剧减少。可能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缺乏做这一工作所必须的耐性，研究24年以后，我确信没有什么比从拉合尔博物馆档案室发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照片的意义更重大。我很难去描述它，在1965到67年，由尽管有热情但完全外行的艺术鉴赏家和完全未经训练的职员一起进行了破坏性的、大规模的藏品重新编号工作。查阅锡克里的收集品的一个旧目录时，只可看到两行文字，写道“1890年3月，在尤萨夫赛（Yousafzai）山谷发现的佛教雕塑。上尉迪恩。”

这就是全部，没有虚构增删。既无遗址的名称，也无准确的日期，更无收到的物品的数量。尽管无明确的记录保存下来，估计锡克里舍利塔是包括在收集品之中的。前任馆长的约翰·洛克伍德·基普林（John Lockwood Kipling）在他1889到1990年的报告中曾提到它。他的继任者安德鲁斯在1893到94年的报告中也论及这舍利塔，但在他的目录中

没有提及它或它的13块镶嵌板。在1890年，赛纳尔（E. Senard）第一个出版了一些出于锡克里的雕塑品，包括禁食悉达多像。从这点，我们确信，1890年3月清单中记录的“出于尤萨夫赛的佛像雕塑”，是绝对不同于锡克里的那一个。现在，收在拉合尔博物馆中的藏品是否有1890年之外的佛像藏品？在安德鲁斯手写目录中2040、2058、2059三件锡克里雕刻品，明白地写着1885、9、20这更早些的日期。仅靠查看库存雕塑品，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一些更早的在锡克里发掘的雕刻品，如1871年从瑟瓦尔特尔（Sawaldher）村附近的修道院遗址，曾发现过的一些东西。此外，英格尔特（Ingholt）也提及很可能是早期从锡克里得到的四件雕刻品，其文物号是62、779、946和1361，他未提供资料来源。伊丽莎白·埃林顿提出它们中有两个可能不是来自锡克里（62#、1361#）。因此，我有一个感觉，即19世纪的藏品缺乏系统的登记，锡克里收集品中就可能有一些是在1888年之前发掘的，未对它们作过记录或记录不科学，并且这其中的一些在1890年之前流入拉合尔博物馆。这是我对遗物的揣测。当关注过去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我们确信：这地点曾被搜寻雕刻品的当地人挖过。但是，我们不知道关于这些发现物品后来经历了什么。

富歇声明，他统计的锡克里350件雕塑品只涉及被送到拉合尔的残损品。这意味着迪恩保留了一些。他于1889年将5个雕塑送给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而伊丽莎白·埃林顿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认定它们是出于锡克里而不是布内尔（Buner）。是否有任何其他物品被送到印度或其他地方的其他博物馆？这一点确实不知。我们只知道在1904年，奥雷尔·斯坦因（Aurel·Stein）先生对得自马尔丹（Mardan）助理委员的227件藏品进行监护。其中一些是“早期收集品的残余”和“以前认为毫无价值的碎片”。这些残片中哪一件

来自锡克里?我不能确定,主要是因为这些收集品不是斯坦因赠送给拉合尔博物馆的。

## 获得的收集品和安德鲁斯 关于锡克里雕刻品的目录

正如在许多博物馆中一样,在拉合尔博物馆中严格意义上的犍陀罗收集品的征集总是一个问题,锡克里收集品也不例外。不同的收集品入藏时间不同,但是没有伴随的任何目录。登记簿中的文字通常是含义模糊的,在任何卷宗中它们不包含任何详细的通用目录。在拉合尔博物馆的例子中,只要登记工作开始或重新开始,馆长或职员作最容易做的事,开始采用一个新的数量系列,代替原先作的那个。这工作常常是不完善的。这种种做法导致四批不同的犍陀罗雕刻品分别编号,而且互不协调。在许多雕刻品上发现了田野编号和出处辨认记号,如“S”,“D”,“M”“MN”和“V”,但并不总是容易解读。

几乎有8年,锡克里收集品存放在库中而未做目录。正如已知的那样,1897年,在富歇的要求下,目录由安德鲁斯开始作。这个目录是今天对全部锡克里雕刻品进行鉴定的基本依据,安德鲁斯的登记簿包含我标注的104页。每页分成三栏:编号,尺寸,出处,和描述。这个清单随意地列了2000多个序号,以2354A结束。但有32栏被打上了×或留着空白,这意味着清单中只有323件,富歇还说道,2000之前的编号用于每一个单独的藏品,以便从大约1200件其他不知出处的雕刻品中鉴选锡克里之物。1903年,富歇进一步扩展清单,最后进入登记簿的号码超过2352。实际上,安德鲁斯几乎完成了他的工作:只有三个雕刻品加进这清单。帕西·布朗所谓“至少有350件雕刻品是从上尉迪恩处收到的”,可能是基于富歇的计算,而非这收集品中的实有雕刻品。富歇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帕西·布朗不可以原谅,因为他是博

物馆的馆长。扣除被划掉的和空白的,实有总数是322,而不是350或355件。

一些时候以后,安德鲁斯对锡克里全部雕刻品所作的编号被删除,给每一件藏品一个新号。坎宁安(Cunningham)开始做编号序列,锡克里文物的新编号是从1228开始到1556结束。这样锡克里雕刻品新编号的总数为328,表明至少从原数中划掉了6个。1950年送到东旁遮普的物品清单和苏瓦查保罗(SuvarchaPaul)发表的目录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增加的编号有2033、2074、2223、2266、2279和2282(在安德鲁斯目录中原先被划掉了),昌迪加尔博物馆承认这实际编号。归根结底,因为有26个编号被划掉或为空白号,拉合尔博物馆从锡克里接受物品的总数是329。新的登记编号是用油漆写在每件雕刻品上。一批由伯爵阿德里安·冯·德(van der Bergh)摄于1905年的照片,显示这些新编号代替了安德鲁斯的最初编号,标记在所有锡克里雕刻品上。例如,禁食的悉达多像以新号1325代替了旧号2099。但是相当奇怪,今天所有可确认的锡克里雕刻品,无论是陈列中的还是库房中的,只具有安德鲁斯编的原始号2000到2354。在1905年照片中看到的后来的序列号,似乎是后来被抹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何时何原因做的这件事。

1950年,作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协议的一部分,从这329件锡克里雕刻品中挑选出98件送到东旁遮普。在印度的大部分出于锡克里的藏品已经出版,可在昌迪加尔博物馆藏品图中看到它们,尽管有待完善。保存在拉合尔博物馆中的这部分经管得没有这样好。博物馆中保存了231件雕刻品,只有161件能确认,其余的70件(占21%)还未认定。我确信,在博物馆中的所有这些未经确认的物品,不管是在陈列室还是在仓库,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探索,从大量的雕刻品中将其选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首先是不适当的存放,失

去了它们最初的编号。安德鲁斯所做的最初的和简短的描述使得对现存雕刻品进行辨认非常困难。像这样的记录,“高浮雕人物”(2004#)、“圆柱残件”(2009#)、“圆柱的方形基座”(2019#)、“物体碎片”(2021#)、“悉达多王子的身体”(2048#)、“大天蓬的一部分”(2051#)、“檐口的一部分”(2060#)、“柱头的一部分”(2076#)等等,很难作为权威性的明晰的描述加以运用。

当1950年,古代遗物的一部分被送到东旁遮普后,更需要修正拉合尔博物馆的记录,从而,一个新的犍陀罗雕刻品登记簿于1965—67年着手编制。但是像以前一样,这工作是不完善的,而且,新登记簿未将全部收集品录入,仅限于展览中的雕刻品而忽视了存放在库房的。作为补救,1974年,我开始在前伊斯兰收藏品管理人,休谟·阿莱(Humera Alam)女士的积极帮助下清理全部收藏品。幸运的是,这次工作做得较为完善。每一件收藏品被测量、拍照、给了新号并增加一个展览号(如果在陈列中)或是一个柜架号(对于那些存放在库房中的)。所有这些新编号之前都有“C”(犍陀罗,在陈列中)或“GR”(犍陀罗,在库房中)。我尽可能地准备了一个新老编号索引,并在卡片索引中做好记录。有计划地做好这一切,最后将资料输入计算机数据库并对职员进行计算机基本训练。可是遗憾的是,在拉合尔博物馆作为主任工作了24年以后,当1998年我离开博物馆时,这个清单还只是零散的单页。

对于锡克里收集品的更为详细的、分析性的研究,是否将真的有助于寻找拉合尔犍陀罗雕刻品中的锡克里遗物?而且,只有一个在研究犍陀罗艺术方面经过很好训练并精通档案文件记录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 有关资料

锡克里收集品主要为色彩不尽相同的片

岩的雕刻品和建筑断片(大多数是灰黑色)。很少有人意识到:包括四个不完整的灰膏雕像和一个砂岩的破旧佛像也是来自那一地区。灰膏像包括一个立佛;壁龛中的佛陀胸像;佛陀的头和肩;佛陀的头。这几个灰膏像可能是同时代的来自特雷里邻近地区,那里大量存在这种材质的雕像,特别是这一地区历史的后一阶段,即公元250—350年。

砂岩断片,破旧的佛陀的躯干,可能有来自塔克西拉(Taxila)的一些游方僧赠送的类似的塑像。那里有3个十分珍贵的雕像,据记录,它们来自两个不同地点:一个菩萨,来自特尔莫拉杰卡(Dharmarajika),注明日期为公元前一世纪;一个苏利耶天(Surya),来自锡尔格普(Sirkap),日期定为公元一世纪,而一个塔拉奇(Taraki)砂岩的马迦罗(Makara)头像具有塔克西拉本地风格,也是来自特尔莫拉杰卡(Dharmarajika)。一个陈列在塔克西拉博物馆中央展厅的同样材质的尺寸更小的立佛,其出处还未确定。另外,拉合尔博物馆库房中有一具不知出处的灰膏做的真人大小的立佛,可能是得自塔克西拉较早的发掘。

## 结 论

总的来说,尽管拉合尔博物馆中的一些藏品现在缺乏发掘报告和必要的记录文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都还是认为锡克里雕刻品很有吸引力,无论是研究造型或图像学,这些藏品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关于现在分布在三个国家五个博物馆中的所有收集品的完整的目录,和对于来自这个地区的收集品进行全面的评价迟迟未得面世。在此期间,有一些关于它的各个方面的简要介绍。

拉合尔博物馆中的锡克里舍利塔,即这遗址的辅助舍利塔可能是在犍陀罗仅有的保存完整的一个,围绕塔身有13个镶嵌板。这13个镶嵌板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两个是本生经故事,另11个是不同内容的佛传故



事。现在为它们重新编了号,无疑它们都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并且是在当希腊风格影响达到它的顶点时即犍陀罗艺术成熟期内完成的这些雕塑,因此,塔的年代可能是公元2世纪。

有11个镶嵌板的另一个组合,都雕于大塔塔身表面,因此,很可能它是这遗址的主塔。每面由三个垂直或水平排列组成。一些镶嵌板中存在细微的不同,主要在上檐口而不是全部形象,上部有一系列拱形龕,龕内有一个人物;中间的一帧总是由一个栏杆或具有两个水平扶手的栏杆组成;同时,底部的一列总是描述一段、两段甚至三段佛传故事的情节。全部图案为24个不同事件。此外,他们全部是由一个艺术家独自雕刻完成的。镶嵌板长度不完全统一,甚至高度也有些微的不同。不像前述那个塔,每一段故事用竖栏隔开,这些佛传故事被放在每个镶嵌板的下部。现在拉合尔博物馆收藏的舍利塔的周长为21.34英尺(6.2米),这些镶嵌板的总长度只有13.78英尺(4.2米),使人想到最初大约不止11个镶嵌板,应该更多些。

35段佛传情节被描绘在两个塔的24块镶嵌板上。这些镶嵌板上的雕刻表现的不是佛本生故事,而是锡克里艺术家比较喜欢的佛传故事。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佛陀诞生的故事,仅在昌迪加尔博物馆就不止6件藏品。在拉合尔博物馆中也有同一主题的一幅漂亮的藏品。这些佛陀诞生故事具有传统的犍陀罗风格也有其他风格和传统。

其他值得注意的锡克里浮雕和断损片有:金刚手菩萨与两个崇拜者,王后摩耶,白象入梦,初转法轮,龙王迦利迦的赞美诗,因陀罗访问帝释窟,佛陀和黑蛇在优楼频罗的火庙中(犍陀罗艺术中最动人的故事),阿难佛涅槃。其他人物形象,包括一个佩刀的女人,一般被识别为鬼子母;一个人首马身女像;夫妻坐像,二者均无头。

综合地说,锡克里雕刻品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一个艺术家群体所制作的,他们为不同的艺术传统所培养,表达不同的风格和规范,或者说,这些雕刻品具有不同传统和风格是出于他们是在这一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制做的。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例如,昌迪加尔浮雕2055,2121和2167表现的佛陀诞生的故事与镶嵌板2315、2322和2343所描绘的相比,明显地属于不同的肖像学世界。后一组为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然而,前者被富歇称为“更接近印度的传统”。在已知的锡克里镶嵌板中,没有描述其他本生经故事,但也有例外,在三个雕塑中可见到燃灯佛(Dipamkara)本生经。许多佛陀和菩萨(大多为观音)表现出个性特征(例如,昌迪加尔和拉合尔)。一些雕塑比例非常匀称,脸和头部通常表现得很精致,造型也很准确,虽然有一些比较粗糙的例子存在。收藏在昌迪加尔博物馆的菩萨在比例匀称和雕刻精美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犍陀罗艺术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与之形成对照,拉合尔博物馆中的弥勒像经常出现在犍陀罗菩萨造像中,表现出印度理想的男性美。

另一个典型的锡克里风格是许多佛像有髭。锡克里舍利塔上的13块镶嵌板中的10个脸部未被破坏;毫无例外,全部有髭。一些来自锡克里的其他例子表现出脸部相类似的特征。然而,无髭的佛头也是大量存在的。两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在昌迪加尔博物馆另一个在拉合尔,表现比例匀称的立佛,也可以在浮雕中看到。

阿特拉斯(Atlas)的形象也大量存在。一个极为精致,比在犍陀罗挖掘的其他人物更为典型,说明这一地区在艺术方面受着希腊风格多么大的影响。佛陀足迹是在犍陀罗艺术中很少发现的佛陀足迹造像。

还有对植物和水的非常细致的描绘。最好的例子是一件表现莲荷的镶(下转67页)

马如玉	清	南京	初为名妓,后为尼	善绘事	多才艺,一时名动
王珏	清	江苏苏州	家贫,母早卒	工花鸟,得唐人笔意	养其父终身不嫁,陈浩为作奇女传
唐素	清	江苏无锡	家贫	工花鸟,钩染得宋人法	尝写百花图卷,名人题咏不下百人。矢志不嫁,鬻画养父
汪琴云	清	浙江杭州		工人物屈画,闺阁中之赵伯驹仇英也	奉亲不嫁,卖画自给
戴佩荃	清	浙江吴兴	戴璐女	有管仲姬笔意画人物秘不示人	卒年仅 23 岁
佐惜惠	清	常州	左昂女		诸姊妹与姑母均善绘事
丁瑜	清	浙江杭州	丁允泰女	其父工写真,女守家学,专攻人物	
尹小霞	清	常熟		工人物,尤善仕女,得费家法度	
梁若珠	清	广东顺德		特善绘蝶	持金乞画者无虚日,县令慕其名,聘为继室
焦希淑	清	山东章丘邱	善湖女史之女	幼承母训工诗画,花卉得恽寿平法	
葛远	清	湖南湘潭	诸生继妻	兼善琴奕书画	虽烹饪、绩、浣、操作无暇,而诗词日进
鲍诗	清		州同怡山次女	从程之廉学画,传陈淳法专写花卉	
缪嘉惠	清	云南昆明		工花卉翎毛	随夫宦游,夫死子幼,后入宫为慈禧代笔,月奉二百金,供奉福昌殿
阮玉芬	清	江苏仪徵	阮元裔	工花卉翎毛	供奉福昌殿,慈禧极常之,赐名玉芬,荣誉不亚缪嘉惠
宋贞	清	上海	许镔妻	夫妇同受业于长州王韬、元和江标,遂娴书画	战乱时日售书画以赈助难民,卒年仅 26 岁
王彩蘋	清	江苏太仓	王原祁七世孙女	山水宗家法,兼善花卉	李鸿章延为女教师,卒年 70 余

(上接 58 页)嵌板(是两片)。在昌迪加尔的卷叶浮雕被错误地归入锡克里收集品,而一个长方形镶嵌板是唯一的一件在多列拱龕下都安排有半身人像,这种结构更容易使人联想起印度的犍陀罗艺术。

最后,尽管锡克里收集品中包括不少制作精美的和珍贵的犍陀罗遗物,然而,远不能

将其说成锡克里艺术流派。这些雕刻品表现出太多的不同风格、子风格,明显具有本次大陆其他地区的影响。所以,不能认为这批东西是同一个时期的产品或单一艺术流派的产物。

(译者单位:中国大连旅顺博物馆)